中美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比较研究

尹木子 崔 岩 高海珍

摘要:基于"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研究了中美公民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研究发现,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大多数为青年人,而美国则表现为全民参与;较之美国公民,中国公民的环保组织参与具有较高的政治倾向。结果显示了两国公民环保组织参与的不同特点、不同环境意识对参与环保组织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环保组织的发展还处于模式选择的路口;其中一个方向是合作主义,另一个方向是被动环境维权。

关键词: 环保组织参与 环境意识 政治参与 中美比较

随着公民环境意识的提升,我国民间环保组织数量逐渐增多。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民间环保组织增长了 38.8% (刘毅 2013)。2014 年 8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同呼吸、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2015 年 4 月 14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公民可参与环境问题的监督和调查处理。但相对于整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环保组织从规模到影响还远远不够,仍存在志愿者缺乏、公民参与意识不足等问题。

环保组织的发展状况虽然已获得学界关注,但研究大多还集中于环保组织的运行模式、活动特点、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周茂荣、聂文星 2004; 刘敏婵、孙岩 2008) 对我国环保组织中的公民参与行为缺乏深入思考。本研究拟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动机,试图回答具有哪些特征的公民更愿意参与环保组织、公民参与环保组织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意识与环保组织参与

学者一般以环境意识为起点,研究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行为,探讨环境意识和环保组织参与之间的关系(王民,1999;任莉颖 2002;沈立军 2008;周志家 2008)。研究发现,公民参与环保组织出于多种动机;参与动机的多元性根源于公民环境意识存在多个维度。学界普遍认为,世界观、后物质主义思想和污染驱动型环境关注对公民环境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童燕齐 2002;洪大用 2006;胡连生 2006;刘计峰 2008;鄢斌 2008)。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被认为是影响公民环境意识的两大世界观(刘福森,1997;曹明德 2002;包庆德、王志宏 2003;陈剑澜 2003)。前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自然是人类任意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在"人类中心主义"导向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是以索取方式进行的,这种发展方式会导致环境危机的发生。与此相对,"自然中心主义"观点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实现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在"自然中心主义"导向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是在尊重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可见,不同世界观所代表的环境伦理必然影响人们的环境意识以及环境行为(童燕齐 2002)。相比而言,持"自然中心主义"观念的公民更看重环境发展,倾向于积极参与民间环保组织和各类环境保护行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公民环境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意识越强,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77、1995)提出,依据人们对生活诉求的先后顺序,可以把环境意识分为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后物质主义者反对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强调自我实现和全方位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才是衡量幸福水平更重要的尺度。在此基础上,

英格尔哈特进一步提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经历了从低层次物质需要向更高层次精神需要的转化,因此环境意识可以看作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物。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水平,更倾向于关注环境发展与保护问题,对民间环保组织有着更高呼应。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公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越高,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有学者(刘计峰 2008) 从环境关注的驱动力角度出发,以污染驱动下的环境关注来讨论环境意识的形成。污染驱动型的环境关注是出于个体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产生的环境意识(Stern et al., 1993) 人们参与环境保护是对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的被动应对。公民的环保参与不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整体关注,而是源于对某些特定环境问题的关注(周志家 2011)。由此可见,基于自身眼前利益的环保参与是污染驱动下的环境行动,其行为动机是以维权性质为核心;而基于对自然和生态关注的环保参与,其行为动机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思为基础,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前者是基于污染驱动型的环境行为,而后者不是基于污染驱动型的环境行为。因此,为了检验中美两国公民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是否是污染驱动型的环境行为,本文提出假设3:公民环境问题意识越强,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合作主义与环保组织参与

由于国家职能的转变、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环保组织越来越具有行动取向,开始扮演公民代理人的角色,在提高公民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洪大用,2007)。对机构的信心体现了公民对该机构实现某种特定效能的评价和反馈,信心高则意味着公民对该机构的效能评价较高,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公民基于对国家的信任,会主动选择参加民间组织,通过制度性途径参与政策制定、政策评估和诉求表达。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公民对机构的信心和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成正相关关系。①公民对国家机构越有信心,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假设 4a);公民对民间组织越有信心,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可能性就越高(假设 4b)。

(三)政治参与和环保组织参与

广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和程序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介入政策制定的过程;同时表达个人或集体的诉求和意愿,以影响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的规则制定、决策过程和效果评估的行为(孙欢、廖小平 2010)。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林智理 2002)。在我国,有学者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指出我国当前发生的环境事件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公民社会参与往往以制度外参与的形式出现(胡永 2008)。可见,区别于其他公益志愿类型的社会参与,环保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5: 具有较强政治活跃度的公民更可能参与民间环保组织。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了"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美国区的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始于1981年包括生活心态模块、环境模块、就业模块、家庭模块、政治模块、社会态度模块和宗教模块等。数据库覆盖近100个国家到2012年为止共进行了六次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区的数据样本量偏少不能满足本研究的需求。因而我们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① 对官方机构的信心和对民间机构的信心之间也可能是负相关关系。如果在某一个特定问题上,当公民认为国家行动不足以实现其诉求和愿望时。公民就有可能参与民间机构。通过自身力量来实现个体要求。但在研究假设中,从理论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假设对两类机构的信心和民间组织参与之间都呈现正向关系。

《青年研究》 2017.4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受访者是否参加了民间环保组织。该变量分为三个尺度,'0'表示未参加任何民间环保组织 "1"表示为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 "2"表示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2. 自变量

包括环境问题意识、环境优先意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机构信心等五方面。

"环境问题意识"这一变量通过受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环境问题的评估来考察公民环保参与的驱动力。在"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通过受访者对所居住地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方面的认知程度来测量其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原因。

"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询问受访者"当讨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时,是应当遵循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即使因此有可能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失业;还是应当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即使这样可能使环境遭到破坏?"如果受访者做出环境优先这一选择,则体现了对环境的认同心理,人们主动关注环境保护,自觉采取行动来抵制环境污染(沈立军 2008; 唐明皓等 2009)。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对我国来说,发展经济比保护环境更重要。"如果受访者认为发展经济没有保护环境重要,则体现了环境意识先行的心理。然而,无论采用哪种测量办法,环境优先意识是否能真正转化为环保组织参与行为,实现组织化、制度化的环境保护参与,还需要检验。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环境优先意识"这一变量。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变量用于检验后物质主义者的价值追求是否对其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影响。在"2012 年世界观价值调查"的问卷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要求受访者从四项(保持社会秩序和稳定;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更多倾听人民的意见;抵制物价上涨;保障言论自由)中选出其优先考虑的两个目标。其中选择二、四选项者被看作是后物质主义者。在"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通过向受访者询问"您在今后 5 - 10 年内最希望实现的个人愿望是什么?"(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信任获得亲情、友情和爱情;获得周围人及社会的尊重、尊敬;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社会使社会变得更好)来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选择以上三项者被看作是后物质主义者。

在"2012年世界价值观问卷"中,通过向受访者询问对军队、新闻媒体等 12个机构的信心来测量"对机构的信心"这一变量。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对政府的信心、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心和对新闻媒体的信心。②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通过向受访者询问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办事人员的信任度测量对政府的信心; 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度测量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③对居委会或村委会和

① 由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样本量为 10206 个 样本量较大。 "2012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中美国的数据样本量为 2232 个。为了保证样本分析数量的大体一致以及分析的相对科学性 本研究使用的中国数据为"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库中 20% 的样本量。

② 一些研究在测量对机构的信心时 对各种机构的信心进行累加处理。然而 不同机构代表不同职能部门 累加处理可能会丢失信息。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公民对上述组织机构的认识 我们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因子进行分析。在对机构信心变量的提取过程中 KMO 值为 0.859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③ 诺里斯(Norris 1999)对广义政府信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政府信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公民对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即对国家的信任,这是最高层面的信任;第二个层面是公民对政治共同体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三个层面是公民对政治行为主体的信任。

狭义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具体政府的信任 通过公民对政府系统的执政理念和政府行为(主体)的信任得以体现(Hetherington ,1998)。政府政治行为的主体通常是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既包括领导干部也包括办事人员);而一些职能部门如公安局政治行为的主体是警察 法院政治行为的主体是法官。所以 本研究使用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办事人员的信任度测量对政府的信心;对警察和法官的信任度测量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测量对民间机构的信心; 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测量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政党参与和政治行动倾向"这一变量包括两个政治活跃程度的测量指标(政党参与、政治行动倾向)。其中"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询问受访者"当权益受到侵犯时,是否会参加政治示威、请愿活动以及过去一年时间里,是否经常参加政治示威、请愿活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询问受访者"最近三年来,您是否参加过参与示威游行和是否过参与罢工、罢市、罢课等行动?"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

(二)方法和模型

本研究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分别比较各类因素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与未参加者 ,以及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与未参加者的作用。

三、结果分析和比较

(一) 受访者基本特征的中美比较

对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频数比较(见表1)。

表 1 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年龄的基本频数

| | 美 | 国 | 中国 | |
|---------|-----|--------|------|--------|
| 年龄 | | | | |
| 均值 | 51 | | 45 | |
| 标准差 | 17 | | 14 | |
| 年龄分组 | 频数 | 百分比 | 频数 | 百分比 |
| 15-29岁 | 66 | 17. 1 | 250 | 16. 6 |
| 30-49 岁 | 98 | 25. 4 | 678 | 45. 0 |
| 50 岁以上 | 222 | 57. 5 | 581 | 38. 5 |
| 总数 | 386 | 100. 0 | 1509 | 100. 0 |

表 2 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性别、教育程度的基本频数

| | 美 | 国 | 中国 | Ē |
|------|-----|--------|------|--------|
| 性别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 男 | 181 | 46. 9 | 703 | 46. 6 |
| 女 | 205 | 53. 1 | 806 | 53. 4 |
| 总和 | 386 | 100. 0 | 1509 | 100. 0 |
| 教育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 低等教育 | 12 | 3. 1 | 482 | 32. 0 |
| 中等教育 | 137 | 35. 5 | 802 | 53. 3 |
| 高等教育 | 237 | 61. 4 | 11 | 14. 7 |
| 缺失 | | | 3 | |
| 总数 | 386 | 100. 0 | 1509 | 100. 0 |

《青年研究》 2017.4

美国环保组织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是 51 岁; 而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是 45 岁。对年龄分组比较后发现 在美国 ,17.1%的环保组织参加者在 30 岁以下; 25.4%的环保组织参加者在 30 岁到 50 岁之间; 而 50 岁以上的环保组织参与者占到总数的 57.5%。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年龄普遍较小 ,61.6%的环保组织参加者在 50 岁以下; 50 岁以上的环保组织参与者仅占到总数的 38.5%。

从性别数据分布上看,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从教育程度分布上看,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存在一定差异。在美国,仅3.1%的环保组织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为低等教育;35.5%为中等教育;受教育程度为高等教育者占到总数的61.4%。与之相比,我国环保组织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占总数的53.3%;受低等教育的占到总数的32.0%,受高等教育者为14.7%。

| 表 3 | 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就业部门的基本频数 |
|---------------|--------------------|
| <i>7</i> ▽ .) | 中美外体组织参与有机业制厂的基本刺激 |
| - LV - | |

| | į | 美国 | 中国 | <u> </u> |
|-----------|-----|--------|------|----------|
| 工作所在部门 | | | | |
|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 政府部门 | 93 | 35. 2 | 28 | 7. 2 |
| 私营企业 | 143 | 54. 2 | 186 | 47. 9 |
| 民间 NGO 组织 | 28 | 10. 6 | 21 | 5. 4 |
| 自营职业者 | _ | _ | 153 | 39. 5 |
| 缺失 | 122 | | 1121 | |
| 总数 | 386 | 100. 0 | 1509 | 100.0 |

表 4 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基本频数

| | 身 | [国 | 中国 | |
|--------|-----|--------|------|--------|
| 社会阶层 | | | | |
|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 上层 | 7 | 1.8 | 1 | . 1 |
| 中上层 | 144 | 37. 8 | 100 | 6. 7 |
| 中层 | 130 | 34. 1 | 628 | 42. 4 |
| 中下层 | 76 | 19. 9 | 453 | 30. 6 |
| 下层 | 24 | 6. 3 | 300 | 20. 2 |
| 缺失 | 5 | | 27 | 1 |
| 总数 | 386 | 100. 0 | 1509 | 100. 0 |

从受访者所在工作部门来看,政府部分在美国所占比例为 35.2%; 而在中国仅有 7.2%。虽然私营企业在中美两国所占比例都比较高 在美国是 54.2%,高于中国的 47.9%。在中国民间 NGO 组织工作的环保组织参与者仅占 5.4% 相对低于美国(其比例为 10.6%)。同时,在中国 39.5% 的环保组织参与者来自自营职业者。由此可见,两国之间在就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比较中美环保组织参与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数据发现,在美国的环保组织参与者中,1.8%属于社会上层 37.8%属于社会中上层 34.1%属于社会中层,19.9%属于社会中下层,仅有 6.3%属于社会下层。而在中国的环保组织参与者中 19.1%属于社会上层 19.9%属于社会中上层 19.9%属于社会中上层 19.9%属于社会中层 19.9%属于社会中区 19.9%

(二)影响公民参与环保组织行为因素之中美比较

本研究建立多项 Logistic 回归定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中美公民参与环保组织行为的因素, 比较两国公民在环保组织参与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其中,模型1是基础模型,仅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环境意识变量;模型3加入机构信心变量;模型4加入政治参与变量。结果如下。

在模型 1 中 就美国(见表 5) 而言,对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其环保组织参与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对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年龄和环保组织参与呈正相关关系($\exp\beta=1.012$ p<0.01)。就中国(见表 6) 而言,性别对公民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公民参与环保组织有显著影响。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公民年龄和环保组织参与呈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时候,年龄每增加一岁,中国公民成为环保组织一般参与者的发生比是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 0.989 倍($\exp\beta=0.989$ p<0.001);成为环保组织积极参与者的发生比是未参加任何环保组织的 0.969 倍($\exp\beta=0.969$ p<0.001)。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的中国公民参加环保组织的可能性越小。数据还表明,教育和环保组织参与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中国公民参加环保组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变量组一: $\exp\beta=1.084$ p<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1.117$ p<0.001)。

在模型 2 中 我们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意识相关变量 有如下发现。

首先 环境问题意识无论对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都有显著影响。就美国(见表5)而言 环境问题意识越强的公民更可能参与环保组织(因变量组一: $\exp\beta=1.490$ $_{\rm P}<0.001$; 因变量组二: $\exp\beta=1.440$ $_{\rm P}<0.001$); 就中国公民(见表 6) 而言 环境问题意识和环保组织参与呈正相关关系 ,环境问题意识越强 ,参加环保组织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变量组一: $\exp\beta=1.035$ $_{\rm P}<0.001$; 因变量组二: $\exp\beta=1.073$ $_{\rm P}<0.001$)。由此可见 ,假设 3 获得验证。

其次 环境优先意识对美国和中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都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 环境优先意识越强的美国公民 成为环保组织参与者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变量组一: $\exp\beta=1.409$ p<0.05; 因变量组二: $\exp\beta=2.075$ p<0.01)。对中国公民来讲 环境优先意识越强 参与环保组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变量组一: $\exp\beta=1.189$ p<0.001; 因变量组二: $\exp\beta=1.375$ p<0.001)。

最后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美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影响有所不同。对美国公民(见表 5)来讲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没有影响 仅对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有显著影响 $(\exp\beta=1.374~p<0.05)$ 。这表明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 成为环保组织积极参与者的可能性就越高。对中国公民(见表 6)来讲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 参与环保组织的可能性越大(因变量组一: $\exp\beta=1.125~p<0.001$;因变量组二: $\exp\beta=1.153~p<0.00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环境意识变量对中美两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具有较大影响。中美两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都是因为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由此 假设 1 和假设 2 都获得了验证。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 模型 3 加入了对机构信心的相关变量。就美国(见表 5)而言,公民对议会、政府和民间组织机构的信心变量与其环保组织的参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假设 4a 没有获得验证)而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对公民参与环保组织有着显著影响。

同时 不论是作为环保组织的一般参与者还是积极参与者 对环保组织的信心通过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因变量组一: $\exp\beta=0.801$,p<0.01; 因变量组二: $\exp\beta=0.568$,p<0.001)。但是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美国公民对环保组织的信心越高 ,越不可能参与环保组织 ,对环保组织的信心不能成为解释环保组织参加者参与环保组织的行为。因此 ,假设 4b 在美国数据中并没有得到验证。

就中国而言(见表 6) 对政府、对司法机关和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任度都与环保组织参与呈正相关关系。对新闻媒体的信心对环保组织一般参与者没有影响,但对环保组织积极参与者有显著影响($\exp\beta=1.413$,p<0.001)。因此,假设 4 在中国数据中获得了部分验证。

| 美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 |

| 表5 | | 11113 | 美国公民参与 | 美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 | 彡响因素分析 | | | | |
|--------------------|---------------|----------|--------------|-------------------|---------------|-----------|--------------|------------|---------------|
| | | 模型 1 | 池 1 | 模型2 | <u>1</u> 2 | 模型 | <u>1</u> 3 | 模型4 | <u>u</u> 4 |
| | | β | $\exp \beta$ | β | $\exp \beta$ | β | $\exp \beta$ | β | $\exp\!\beta$ |
| | 常数项 | -2.400 | . 091 | 1. 235 | 3, 440 | . 947 | 2. 579 | 3.149 | 23, 309 |
| | 性别(0:女) | 144 | . 865 | 067 | . 935 | . 004 | 1.004 | . 180 | 1. 198 |
| | 年龄 | 900 · | 1.006 | . 004 | 1.004 | * 800 . | 1.008 | . 007 | 1.007 |
| | 教育程度 | . 039 | 1.039 | 030 | 026. | . 014 | 1.014 | 272 * | . 762 |
| | 环境问题意识 | | | . 339 *** | 1. 490 | .316*** | 1.374 | . 242 * | 1. 273 |
| | 环境优先意识 | | | . 343 * | 1.409 | . 177 | 1. 193 | * 006 . | 2. 459 |
| 1. 环保组织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 | | 620 . | 1.082 | 860. | 1. 103 | 074 | 1.007 |
| 一般参与者 | 对政府的信心 | | | | | 132 | . 876 | 057 | . 945 |
| | 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 | | | | * 660 . – | . 905 | . 133 | 1. 142 |
| | 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心 | | | | | . 173 | 1.889 | . 166 | 1.180 |
| | 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 | | | | 081 | . 922 | 177 | . 890 |
| | 对环保组织的信心 | | | | | 222 ** | . 801 | 331 | . 718 |
| | 参加请愿活动(0:没有) | | | | | | | . 570 | 1. 768 |
| | 参加抵制活动(0:没有) | | | | | | | * 797 · | 2. 220 |
| | 常数项 | - 4. 494 | . 011 | . 212 | 1. 236 | . 665 | 1.944 | 3.824 | 45. 767 |
| | 性别(0:女) | . 156 | 1.169 | . 207 | 1. 230 | .372 | 1.450 | 1.015 | 2. 760 |
| | 年龄 | . 012 ** | 1.012 | . 016** | 1.016 | . 022 ** | 1.022 | 600 . | 1.009 |
| | 教育程度 | . 126 | 1.134 | . 005 | 1.005 | . 040 | 1.041 | . 092 | 1.096 |
| | 环境问题意识 | | | . 364 *** | 1.440 | . 365 *** | 1.465 | . 334 *** | 1.376 |
| | 环境优先意识 | | | . 730 ** | 2. 075 | . 425 | 1.530 | . 688 | 1.990 |
| |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 | | . 318* | 1.374 | . 178 | 1. 194 | 888 * | . 412 |
| 0 环伊州和 | 对政府的信心 | | | | | . 195 | 1.215 | . 345 | 1.412 |
| 2. 4. 不出災 出故冬口材 | 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 | | | | . 283 ** | 1.327 | 1. 534 *** | 4. 637 |
| 农农参与在 | 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心 | | | | | 192 | . 825 | 288 | . 750 |
| | 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 | | | | 140 | . 870 | 917 *** | . 400 |
| | 对环保组织的信心 | | | | | 565 *** | . 568 | 537 | . 585 |
| | 参加请愿示威(0:没有) | | | | | | | 1.557 | 4. 734 |
| | 参加抵制活动(0:没有) | | | | | | | . 585 | 1. 795 |
| | Cox and Snell | . 002 | . 094 | . 104 | . 238 | | | | |
| | Nagelkerke | . 004 | . 172 | . 189 | . 350 | | | | |
| | McFadden | . 004 | . 170 | . 192 | . 370 | | | | |

注:1. 参照组未参加民间环保组织;2.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1.103 1.145 1.105 1.336 1.085 1.085 1.205 1.136 1.665 986 1.067 1.124 1.095 508 1.149 886 1.269 1.087 1.200 1.397 979 1.041 1.031 1.641 1.531 $\exp \beta$ 模型4 238 *** 040 *** *** 860 082 *** .082 *** . 127 *** 084 *** . 182 *** . 334 *** . 065 *** 091 *** . 135 *** . 186 *** - 2. 074 *** -. 012 *** -. 014 *** . 117 ** -.677 . 290 * . 133 .030 . 100 . 495 . 139 426 * 510 800 Ω 1.075 1.045 1. 122 1. 108 1.095 1.034 1. 138 1.216 1.136 1.086 1. 193 1.413 686 1.097 1.088 1.267 1. 121 991 模型3 . 115 *** *** 440 102 *** 091 *** 072 *** 346 *** -. 011 *** . 129 ** 093 *** 084 *** 237 *** 196 *** . 128 *** 083 *** . 177 *** -2.301*** -. 009 033 * -. 398 . 134 . 158 ω 中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 1.075 1.035 1. 189 1. 125 1.098 1.073 1.375 . 186 . 198 994 1.253 991 46 模型 2 . 118 *** . 073 *** 034 *** . 173 *** . 071 *** .319 *** . 094 *** -1.317*** -. 006 -. 000 . 146 . 128 226 * . 177 . 185 . 197 43 Ω 986 1. 138 686 1.163 1.117 . 165 . 174 1.084 33 模型 -. 010 *** .111 476 . 129 -. 011 . 081 . 151 -. 657 054 047 23 ω 政党参与(0:没有参与政党) 政党参与(0:没有参与政党) 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心 对民间服务组织的信心 参加请愿示威(0:没有) 参加抵制活动(0:没有) 参加请愿示威(0:没有) 参加抵制活动(0:没有)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对司法机关的信心 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环境优先意识 对政府的信心 对政府的信心 环境问题意识 环境问题意识 环境优先意识 Cox and Snell 性别(0:女) 性别(0:女) Nagelkerke 教育程度 McFadden 教育程度 常数项 常数项 年龄 1. 环保组织 一般参与者 2. 环保组织 积极参与者 耒

《青年研究》 2017.4

在模型4中,进一步加入了政党参与的相关变量。就美国而言(见表5),就公民政治行为来 看 是否参加政党或请愿活动对公民参与环保组织没有显著影响 参加抵制活动的公民比没有参加 抵制活动的公民更可能成为环保组织一般参与者($\exp\beta$ = 2. 220 p < 0. 05); 而是否参加请愿活动对 公民成为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影响。就中国而言(见表6),参加政党对公民的环保组织参 与有显著影响(因变量组一: expβ = 1.336 ,p < 0.05; 因变量组二: expβ = 1.531 ,p < 0.001) 是否参加 抵制活动仅对环保组织一般参与者有影响,没有参加抵制活动的公民更愿意参与环保组织(expβ = 0.508 p < 0.05)。因此 假设 5 获得了部分验证。

四、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美两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公民在参与 环保组织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美两国环保组织的参与者有较大差异。中国公民参与民间环保组织受教育程度的影 响显著,主要以青年人、成年人参与为主;美国公民参与环保组织不受年龄、教育程度的影响,体现 出全民参与的特点。

究其原因 ,首先 ,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出现较晚 ,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及东部沿海地 区以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其次,宣传不够到位,公民缺乏环境意 识 缺少了解环保组织的渠道。最后 ,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者多为年轻人 ,他们受教育程度较 高 拥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维权意识 对身边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具有积极应对和解决问题 的心态 更倾向于参与环保组织和环保活动。相比而言 美国社会早已达到发达水平 经济社会的进 步促进了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熟、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美国环保组织的全民参与已经常态化。

第二 公民在环保组织中的参与行为是建立在环境保护效能的认知基础之上。美国环保组织 参与者正是缘于对环保组织功能的认可,对环保组织的信心,促使他们参与环保组织的各项活动。 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对政治主体具有较高信心 但这更多是对政府主体的信心 而不是对所处政治 系统的制度安排、运行原则、制度表现等方面的信心。正是由于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效果欠 佳,才促使我国公民参加环保组织,以辅助政府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中国公民参加环保组织体现 出了明显的"制度外参与"特征。

第三 ,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的政治倾向高于美国环保组织参与者。 在政治活跃度上 美国环保 组织参与者并没有比其他群体呈现出更强的政治行动倾向 他们选择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与政治 行动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更多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目标。而中国环保组织参与者呈现出较高政治 参与意识 倾向于用政治途径解决环境问题。虽然他们对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效果缺乏信心 ,但解 决途径还是倾向于向政府呼吁,依靠政府颁布各项环境政策,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也反映出中 国环保组织自身力量相对弱小 旅靠自身行动难以达成相应目标。

美国环保组织的对抗对象通常是不注重环境保护的公司企业 ,通过各种途径迫使这类企业放 **弃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我国环保组织采取行动的对象是呼吁国家行为。这说明了两种不同行动方** 式之下的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渠 道,公民意愿在政治层面之外缺乏有效的上达途径。因此,公民倾向于采取偏激的方式向政府表达 诉求。但这种关系模式既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又容易形成政府与公民的对抗。

总体来看 ,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还处于模式选择的路口。其中一个方向是合作主义 ,另一 个方向是被动环境维权。前者是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家政府的认可下开展各项环保活动,时刻保持 着与国家的联结并争取国家对其环保活动的支持; 后者是针对我国现存主要环境问题开展的公民 维权活动 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威胁公民生存和健康的环境问题。两条道路虽然代表着不同的发展 方向 实际上并不相悖 ,两种模式的结合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有效途径。但是 ,民间环 保组织要想真正发挥其效力,还需要建立全民参与环保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包庆德、王志宏 2003,《走出与走进之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4期。

曹明德 2002,《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陈剑澜 2003,《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批判》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4卷第1册)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洪大用 2006,《环境关心的澜量: NEP 量表在我国的运用评估》,《社会》第 5 期。

2007,《我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连生 2006,《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一现代西方社会价值理念的转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

胡永 2008,《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政治学探究》,《社会科学论坛》第9期。

林智理 2002,《生态环境问题对政治活动的影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版)》第3期。

刘福森,1997,《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刘计峰 2008,《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11期

刘敏婵、孙岩 2008,《国外环境 NGO 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环境保护》第1期。

刘毅 2013,《我国环保民间组织近八千个》,12 月 5 日(http://paper. people. com. cn/rmrbhwb/html)。

任莉颖 2002,《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杨明主编《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北京: 华夏出版社。

沈立军 2008,《大学生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特点及关系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孙欢、廖小平 2010,《政治参与主体的伦理维度——兼及环境伦理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期。

童燕齐 2002,《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取向──对我国六城市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的调查》,杨明主编《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北京: 华夏出版社。

王民,1999,《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鄢斌 2008,《社会变迁中的环境法》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周茂荣、聂文星 2004,《国外关于世界环保组织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周志家 2008,《环境意识研究: 现状、困境与出路》,《廈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011,《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厦门居民 PX 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社会》第 1 期。

Hetherington , Marc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 92 (4) .

Inglehart , Ronald 1977 ,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1).

Norris, Pippa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rn , Paul C. , Thomas Dietz & Linda Kalof 1993, "Value Orientation ,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5(5).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尹木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崔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海珍)

责任编辑: 王 兵

have daughters in gender structure.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n preference" and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the maximum number of children is three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rtility intention between old gener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tratum could increas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fertility intention,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Children's Gender Structure Family's Economic Restriction Son Preference Floating Popul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Abstract: Regard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or mobility, they usually follow the analytical thinking in economics, and argue that the main goal of labor migration is to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individual or family inco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migh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migration scope after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factor. Firstly, when the individuals have siblings or spouse in hometown to take care of parent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long-distance migration. However, if there is nobody left in hometown to take care of parents, then the individuals will have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and could only choose the near-distance migration. Secondly, the support responsibility could have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tion scope of the Han people, the rural people, the less educated people and the older people,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th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level and the trend of family-oriented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more and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migr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o siblings and spouse in hometown in the future, and their migration scope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support pressure greater. Hence, th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ulting problems.

Keywords: Left-behind Parents Migration Scope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Family Strategy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on the Youth's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Lei Kaichun (45)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test and construct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of youth's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collective emo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atus identity and moral belief influence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significantly. The moral belief and status identity could act as indirect influence, and the collective emo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uld act as direct influence.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emotion are the total mediation variables of status identity, and the status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emotion are the total mediation variables of moral belief. The collective emo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paths, and there is no mutual augmentation effect.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o inspire the ne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study has showed that the moral belief is the key factor to integrate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the internet efficacy 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netize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Keywords: Youth Internet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ical Path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2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2013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among citizen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most participa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are young people, while nearly all the people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in United States. Comparing to the citizens in United States, Chines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has higher political tendency. The results have reveale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among citizens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on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s still at the crossroad of pattern selection. One direction is corporatism, while another direction is passive environmental rights protection.

Keyword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bstract "Gao-ji" implies the homosexual behavior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It has strong connotations of homophobia and derogation. But recently, it has been used more frequently to describ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sexual men.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arou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homophob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masculin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gao-ji" discourse has manifested a new form of male homosociality, and hence shapes the heteromasculi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new boundary. After presenting the context of the popularity of "gao-ji" discourse in China's internet cul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ao-ji" discourse in daily life, and reveals its two latent func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could extend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heteromasculin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could strengthen the status identity of heteromasculinity. Hence, we could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unexpected popularity of "gao-ji" discourse with the connation of homosexuality.

Keywords: Gao-ji Homosexually-themed Discourse Heteromasculinity Chinese Urban Youth

Abstract: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 ,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cau students' study in mainl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 the pull factors include the recommendation policy , the cultural attraction , the higher reputation of mainland universities and major recognition , the well-operated Macau students association within the universities , and lower education cost , etc. The push factors include the Macau society's prejudice of poor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mainland , the longer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in the two places , the mismatching between major supply and demand , poorer accommodation condition and higher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other regions , etc. In all , for mainland universities , there are many available spaces in attracting Macau students.

Keywords: Macau Students The Choice of College Entrance Push-pull Theory

The Study on Young Women's Veil Ideas in Palestine Zhao Xuan (86)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rea, many women in Arab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removed their veils. But in recent decades, they wear veils again. Regarding this topic, the existing explanatory framework mainly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and modern trend. This study selected a Palestinian community at mount Olivet area in eastern Jerusalem as the location of field study. Through observing the phenomenon regarding the Palestinian young women wearing veils, we try to further supplement and reflect the former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On this basis, we try to find and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in local society on young women's veil ideas, and hence provide more integrative explanatory framework.

Keywords: Palestine Young Women Veil Ideas